

近代史学刊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章开沅 严昌洪 主编

第9辑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主办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近代史学刊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章开沅 严昌洪 主 编

第9辑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主办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史学刊 第9辑/章开沅 严昌洪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622-5451-5

I. ①近… II. ①章… ②严… III. ①中国历史:代近史—研究—丛刊
IV. ①K25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3848 号

近代史学刊 第9辑

主 编:章开沅 严昌洪◎

责任编辑:沈继成

编 辑 室:文字编辑室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upress.com>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字数:320 千字

开本:880mm×1230mm 1/16

版次: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数:1-1000

责任校对:易 雯

封面设计:罗明波

电话:027-67863220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督印:章光琼

印张:13.75

印次: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5.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近代史学刊》编委会

主编

章开沅

执行主编

严昌洪

编辑委员会成员

章开沅	张海鹏	冯天瑜	钱乘旦
马 敏	严昌洪	罗福惠	朱 英
彭南生	邱 捷	吴景平	李长莉

编辑部成员

严昌洪	罗福惠	朱 英	彭南生
刘家峰	许小青	郑成林	彭 剑

本期执行编辑

彭 剑

(本刊实行国际通行的匿名审稿制度)

目 录

民初政治与军事研究

张永:民初陆内阁危机与临时参议院的受挫	1
钟城:章宗祥“卖国”辨伪	10
邝智文:从军事角度重看 1925 年郭松龄反奉	18

中日研究生论坛选登

史洪智: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近代“破产”概念的形成	36
陈明:试述 1917 年教育、实业两厅的创设	55
易丙兰: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的缘起与活动探析	71
潘吉玲:橘朴的中国社会和国家论	85
吴 恒:“华人与狗”与“‘华人’与‘狗’” ——以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为中心重新检视近代上海租界公园歧视华人的史实与传闻	106
李慧强:日本 20 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研究述评及若干相关问题思考	125

专题研究

王莉娟、苏智良:上海西门妇孺医院研究(1884—1952)	135
刘俊峰:清末民初政治变革中的杭州钱业	151
滨田直也著,陶波译:孙文与贺川丰彦 ——以 1920 年在上海的会谈为中心	161

辛亥革命研究反思

潘光哲:共相与异相之间:辛亥革命研究的一些省思	177
何卓恩:台湾学者对辛亥革命性质的解释	182

杂录

章开沅:永远的遗憾 ——忆 1990 年夏季为钱穆办理回乡探亲的一桩往事	187
方定一:方觉慧先生小传 ——纪念先父逝世五十周年	190

书评

周积明、雷平：“百年”历史 宏大献礼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读后…………… 200

谢放：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历史长卷

——评《辛亥革命史事长编》…………… 204

谢俊美：一部全方位阐述百年来辛亥革命研究和纪念活动的力作

——罗福惠、朱英主编《辛亥革命百年记忆与诠释》一书读后…………… 213

民初陆内阁危机与临时参议院的受挫

张 永

内容摘要 民国初年在法律上是由临时总统、内阁、临时参议院分享权力，北京临时参议院中以同盟会议员为代表的势力希望通过建立政党责任内阁控制权力，袁世凯为维护自己的权力坚持混合内阁的主张。参议院多数抓住陆征祥不善演讲的机会，轻率地想通过否决陆内阁六总长显示权威，但是由于不能得到社会舆论和多数势力的支持，遭受严重挫折，反而加强了袁世凯的地位。这一事件生动地揭示了以议员为代表的新兴势力政治上很不成熟，并预示了民初议会制度由于缺乏深厚的社会基础必然失败。

关键词 内阁 北京临时参议院 袁世凯 陆征祥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根据《临时约法》建立了议会制共和国，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唐绍仪任内阁总理。4月政府从南京迁到北京，临时参议院北迁后发生很大变化，经改组人数从四十多人增至一百多人，原来同盟会的优势已经失去，形成共和党、同盟会、统一共和党三足鼎立的局面。唐绍仪坚持同盟会责任内阁的主张，对袁世凯的权力构成了威胁，因此受到袁的压迫，6月愤而辞职。

一、陆征祥出任总理

唐绍仪辞职后，袁世凯继续坚持成立混合内阁的政见，直言不讳地对政党内阁、责任内阁、甚至《临时约法》中的有关规定提出批评。他在因唐内阁辞职问题接见同盟会代表张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时发表了一个讲话，公开刊登在《政府公报》上，可以认为这是袁氏在民初的政治宣言书，其主旨就是反对责任内阁制，认为权力应集中于总统。

袁世凯认为“吾国今日政党方在萌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甚至假惺惺地说“若再越数年，民国基础巩固，政党亦皆发达，人才辈出，届时余已退老山林，听诸君组织政党内阁可也”，他的主张即所谓“但问其才与不才，无论其党与不党”。袁进而批评《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同意权使人才裹足，“盖一经参议院不同意，则一生名誉扫地，人亦何苦轻于尝试耶！”最后袁世凯着重阐发总统责任，实际是反对《临时约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度：“临时约法特设总理，大总统不负责任。以余观之，所谓不负责任者，亦有大小之区别。譬之商店，国民如东家也，大总统如领东也，国务员犹掌柜也。商业之计划

布置,银钱货物之经理出入,固掌柜之责任,然苟掌柜不得其人,驯至商业失败,濒于破产,则领东不能不负责任,东家亦不能为领东宽。现在国务员当行政之要冲,一国政务罔不赖其筹划,政务之得失自属国务员之责任。然苟国务员之失职,驯至国随而亡,或虽不亡,而至于不可救药,则大总统究能不负责任否?国民能不责备大总统否?”^①

6月29日,袁世凯提请任命前外交总长陆征祥为总理,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到参议院说明原因,征求同意。梁士诒说明任命陆为总理的理由虽分内政、外交两方面,但仍以外交为主:“目前悬而未决者,如东三省、蒙古、新疆伊犁、片马外交之事,此数处于各国均有关系,而俄国之关系犹大,东三省、蒙古、新疆均无一不与俄国有关系。陆君久居欧洲,而在俄国又有十一年之久,深知俄国之内情,将来与俄国之外交上必可得优胜之地位。况当此交涉纷纭之际,非有深于外交、持重不变而为国民之所信仰者,必不能任总理。陆君既深谙外交,则将来出与列邦相见必可得列邦之信用,庶可以收折冲樽俎之效。”^②

共和党支持超然内阁的主张,6月20日曾通电全国:“对外对内同盟会员实不宜再为总理,而本党组织内阁之机亦尚未成熟,应由大总统遴选无党派者,任为超然总理。”^③所以梁士诒刚介绍完毕,共和党张伯烈马上发言支持:“本员对于大总统任命陆征祥君为总理非常欢迎、非常赞成,理由稍为说明:其一,当此危急存亡之秋,不能不有急于救济之策,陆君外交本有信用,中国对于内政固甚紧要,外交尤为紧要,此次陆君任外交总长时,各友邦非常信用,当其受任之初,各国公使不待陆君拜访,首先拜访陆君,其对于他人从无有此举动,可见陆君久为外人所信仰;其二,位置可超然,本员立言本无所谓党见,但与其有党,总不如超然之为愈。”^④

同盟会对陆征祥出任总理也不反对,因为同盟会的政党内阁主张主要着眼于将来,特别是正式国会成立后的正式政府,对于组织过渡性的临时政府并不特别积极。所以后来9月下旬陆内阁因张振武案倒台时,本有宋教仁出任总理之议,而国民党中最有总理抱负的宋教仁却“坚辞决绝”,其理由即为“临时政府期内,为时太促,不能多所展布”,认为以在野地位培养声望是更好的策略^⑤。并且同盟会四代表6月20日面见袁世凯时已经表示:“此次唐总理及同盟会国务员之辞职,实因政治不能进行,深恐贻误大局,绝非对于他党别有意见,此次辞职之后,无论大总统任命何人组织内阁,同盟会无不力表同意,竭力维持。”^⑥

在共和党的积极支持和同盟会、统一共和党的消极认可下,任命陆征祥为总理以74票对10票的绝对优势顺利通过临时参议院。但是,由于同盟会主张政党内阁,宋教仁、

① 《政府公报》1912年6月22日。

② 1912年6月29日参议院会议速记录,1912年7月9日《政府公报》附录。

③ 《共和党主张超然内阁通告全国政团电》(1912年6月20日),《时报》1912年6月22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2页。

④ 1912年6月29日参议院会议速记录,1912年7月9日《政府公报》附录。

⑤ 《答〈民立报〉特派员问》(1912年10月7日),陈旭麓编:《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422页。

⑥ 《政府公报》1912年6月22日。

蔡元培、王宠惠、王正廷相率辞职。熊希龄、施肇基也跟着辞职。到7月14日，除北洋派掌握的外交、内务、陆军、海军四部仍旧外，财政、交通、工商、农林、教育、司法六部总长都出现空缺。于是7月18日袁世凯、陆征祥提出周自齐（财政）、章宗祥（司法）、孙毓筠（教育）、胡瑛（农林，后改王人文）、沈秉堃（工商）、胡惟德（交通）六人到参议院征求同意，原以为可以像上次一样顺利通过。不料，各种因素凑合到一起，竟然导致六人全被否决，并进而引发推倒总理陆征祥的运动，意外地掀起了一场震动全国的政治风波。

二、否决六总长与倒阁风潮

导致陆征祥内阁风波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它们基本上是彼此独立的：

第一个因素，同盟会鉴于唐绍仪混合内阁的失败，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表示不谋求本党组阁，但声明本党党员不加入混合内阁。但是袁世凯一方面为了打击政党内阁的思想，一方面为了表示对同盟会的重视，提出的六人中竟然仍有孙毓筠、胡瑛（后改王人文）、沈秉堃三人是同盟会员。不料，这反而引起同盟会的不满，宋教仁斥之为逼奸政策，遂决议对于同盟会以外之国务员同意与否自由投票，对于沈、胡、孙三人一律投不同意票^①。这样同盟会对国务员提名大体持反对态度，不过当时党纪不严，不少议员并不赞同党议，也不一定按党议投票，且此时同盟会仅反对国务员提名的不当，并无推翻陆征祥之意。

第二个因素，统一共和党由于在内阁改组中遭到各方冷落心怀不满，有意通过否决显示自己的实力。本来统一共和党的立场与共和党稍近，也是主张维持政府的，但混合内阁名单提出后，发现不仅没有本党党员，而且事先竟然未与本党协商，遂大感失落。有记者探访到不少内情：“自发生新国务员问题后，总统府并无人正式与统一共和党接洽，已心怀不乐，继见所拟任命者无北方人（此为吴、谷两派之心理）。最重要之原因则以国务院秘书长王广圻于十六日晤吴景濂，告以总统因共和党反对胡瑛已改王人文。在王秘书长就事论事，不甚知党派之关系，率然言之，而吴则引为大戚，当时神情冷淡异常，嗣谓他人曰：‘总统专取共和党的话。’”后来19日投票时，作为议长的吴景濂请假缺席，或许是有意回避。又有统一共和党员对记者透露：“共和党目中未必有统一共和党，至大总统亦仅知有同盟会与共和党，故本党人甚为不平，实言之，此次新提出之国务员意在全体反对。”^②

有这前两个因素，已经使六名新国务员的通过面临很大困难，特别是同盟会的孙毓筠、王人文、沈秉堃三人很可能遭否决，18日议场的紧张空气已经显示出这种迹象。当日上午政府任命六国务员的咨文在参议院宣读，同盟会、统一共和党主张当天投票，共和党因出席人数不全，主张明日投票，以便疏通。双方剑拔弩张、拍案大骂，刘成禺和李述

^① 《组织第二次内阁之结果》，《申报》1912年7月27日。

^② 《呜呼统一共和党之作用》，《申报》1912年7月23日。

膺几乎动手打架，后议长决定 19 日投票^①。此时对立双方虽然情绪激动，但当时党议约束力不强，大量议员观点游移，态度并不明朗，因此投票结果还难以预料，而 18 日上午陆征祥到院介绍新国务员的演讲使形势戏剧性地急转直下。

这第三个因素极具偶然性，陆征祥介绍新国务员的讲演引起了参议员的不满，导致以共和建设讨论会为代表的许多议员临阵倒戈，改变了原来支持或游移的立场，并进而由否决国务员发展到推倒总理陆征祥，引发了一波政海巨潮。陆征祥 18 日上午在参议院发表的这篇有名的讲演，主要内容如下^②：

征祥今日第一次到贵院与诸君子相见，亦第一次与诸君子直接办事，征祥非常欣幸。征祥二十年来一向在外，此次回来又是一番新气象。当在外洋之时，虽则有二十年，然企望本国之心一日不忘。公使三年一任之制尚未规定，所以二十年中回国难逢机会。然每遇中国人之在外洋者，或是贵客、或是商家、或是学生、或是劳力之苦民，无不与之周旋，因为征祥极喜欢本国人在。在衙署之时，不过一小差使而已，并无了不得，厨役一层亦要烦自己之开单。此次回来，本国朋友非常之少，尚望诸君子以征祥在外洋时周旋本国人来对待征祥，则征祥非常厚幸。二十年间，第一次回国仅三个月，在京不过两星期，第二次回国还是在前年，在本国有十一月左右。回来之时，与各界之人往来颇少，而各界人目征祥为一奇怪之人物，而征祥不愿吃花酒，不愿恭维官场，还有亲戚亦不接洽，谓征祥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钱，所以交际场中极为冷淡。此次以不愿吃花酒、不愿恭维官场、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钱之人，居然叫他来办极大之事体，征祥清夜自思，今日实生平最欣乐之一日，在外国时不知有生日，因老母故世颇早，此回实可谓征祥再生之日。以上所说之话，不在公事之内，今且言政事，今日征祥到院，为说明提出国务员之理由。……以上数君，分任部务，皆甚相宜，尚望贵院诸君子赞成通过，使内阁早日成立，因为有数部总长十四日起已经不到部视事，当此存亡危急之秋，断不能使内阁一日不成立，今日提出六君子，甚望贵院诸君通过。

陆征祥的讲演，态度很诚恳，内容有些琐碎，但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妥之处，但由于声音细弱，又操上海一带吴依软语，在参议院大庭广众之下，只听得嗡嗡然不知其所云，江苏以外的议员或许只能听出“厨役”、“开单”、“吃花酒”、“借钱”之类的单词，听不出连贯的意思，与议员们原来期待的，国务总理第一次到参议院发表雄才大略的政策完全是南辕北辙，多数议员大为失望。

以汤化龙、刘崇佑为首的共和建设讨论会本来与共和党同抱支持新内阁的态度，至此转向反对，使得立宪派发生了分裂。共和建设讨论会不以政党自命，在参议院的六、七个议员大多跨党，势力并不大，但其清高的态度颇为舆论所推，再加上汤化龙、刘崇佑等的个人威望，对为数众多的各党边缘议员影响很大。当日共和建设讨论会开议员谈话会，认为“陆总理出席无政治家资格，大失希望”，“议决对于陆总理不能信任，对于所提出各国

① 北京特派记者函：《否认阁员旁观录》，《民立报》1912 年 7 月 26 日。

② 1912 年 7 月 18 日参议院会议速记录，1912 年 8 月《政府公报》附录。

务员不主张通过，各党亦多同意”^①。统一共和党事后的通电亦称：“自唐总理辞职，共和党主张超然内阁，本党亦表同情，故陆总理提出，参议院同意者有七十四票之多，即此次提出之国务员，本党原非全不同意。不料陆总理第一次到院发言，猥琐支离、毫无政见，旁观骇异，全院失望，故翌日投票不同意者占多数，非仅六总长问题，实为陆总理不信任问题。”^②

本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对于否决国务员的意见并不统一，统一共和党中殷汝骊、周钰等南方人多主维持，同盟会中杜潜、刘星楠等亦不主否决，两党坚守党议的核心议员很难否决全部国务员，并且两党事前都没有反对总理陆征祥的意思。到陆发表讲演之后，议员大多不满意，反对派因意外得此大好理由而异常兴奋，中间派动摇起来，共和建设讨论会由赞成转向反对后，带动了一批立场游移的议员，三种力量汇合到一起，已经在参议院占有优势，而且否决已不再是针对国务员个人，而是要推翻总理陆征祥，彻底改组内阁。

19日晨，参议院气氛极为紧张，与往日大不相同。平时议员们相当懒散，虽然规定上午九点开会，但一般到九点半甚至十点以后才能凑足将近六十人的法定半数正式开会，而19日刚刚九点，议员已到九十多人，赞成和反对双方都是有备而来，山雨欲来的压抑气氛令人窒息。袁世凯已得知18日许多议员对陆的讲演不满，多党正在策划以否决国务员推倒陆内阁，所以19日一早就咨文到参议院要求推迟表决，但遭到拒绝。临时参议院历史上空前绝后地有98名议员参加了投票，结果周自齐得35票、章宗祥得38票、孙毓筠得11票、王人文得41票、沈秉堃得37票、胡惟德得36票，无一人得票超过半数49票，全被否决。从投票结果可以看出，共和党党议是否决孙毓筠一人通过其他五人，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共和建设讨论会都决定否决全体以推倒内阁。结果揭晓后，反对派议员鼓掌欢呼，统一共和党领袖“谷钟秀出场语人曰：‘吾看共和党气焰还了得，今日看他怎么样’，言次捋髭仰面微笑”^③。而共和党议员悲愤异常。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在这次党派最为分明的斗争中，仍有部分议员无视党议坚持自由投票，比如同盟会刘星楠不仅投赞成票，并且开票后“起云：‘今日国务员全通不过，即陷国家于无政府之地，本员实觉二十四分悲观，乃复拍掌，真无心肝。’言次，泣下沾襟”^④。共和党则立即通电全国，谴责同盟会、统一共和党推倒内阁、破坏大局。

反对派表决获胜后，欢欣鼓舞，兴冲冲地筹划改组内阁。陆征祥组阁失败，立即提出了辞职，同盟会“跃跃欲试，宋教仁、蔡元培之声又震耳鼓，某语记者曰：‘刻下同盟会又有组织内阁之机会，如统一共和党要求加入一二人于国务院，可勉强承认，若共和党则汤化龙或有商量之余地，其他绝对的不要。’”^⑤共和建设讨论会则在19日当天下午就开临时大会，急忙发起院内各党协议会，提出改组内阁三项主张：一、新总理只看人不论党

① 《二次阁员否认后之各政党》，《申报》1912年7月29日。

② 《北京统一共和党本部电》，《申报》1912年7月24日。

③ 《组织第二次国务院之结果》，《申报》1912年7月26日。

④ 《组织第二次内阁之结果》，《申报》1912年7月27日。

⑤ 《组织第二次内阁之结果》，《申报》1912年7月27日。

派；二、认可新总理就通过其提出的所有国务员；三、参议员一律不入阁^①。一时间，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似乎确有联合组阁的机会。

三、倒阁不成，参议院反遭重创

但是议员们实在太天真了，他们以为法律条文上规定的权力就是真实的权力，没有看到自己权力的真实来源，没有看到议员作为代表一旦违背了其支持力量，就会瞬间变得虚弱无力。议员们以为自己掌握神圣的立法权，可以自由行事，没有看到当时中国真实政治力量给他们的活动空间极为狭小，稍有动作，就会碰到坚硬的墙壁上。当他们像一群恶作剧成功的孩子在参议院欢呼鼓掌、安排新内阁时，竟然没有预料到他们将要得到的不是内阁权力的奖赏，而是来自全国声讨斥骂的怒潮和强权者的打击。

六总长被否决的消息一传出，全国舆论一片哗然，纷纷严厉批评参议院的轻率举动。日本桂太郎访俄签订有关满蒙密约和英国在西藏将自由行动的消息刚好在此时披露，更加剧了舆论对参议院蓄意挑起内争的不满。撇开相互攻讦的各党机关报不提，专以南北最有影响的两大无党派报纸上海《申报》和天津《大公报》为例，大致可以代表当时的舆论倾向。7月22日《申报》头版评论称：“吾今而后知亡国之惨不在远矣！内而匪徒四起，兵警时闻，未裁之军旅岌岌可危，已撤之士卒流为盗贼；外而日俄谋于东，英逞于西，德法美伺隙于旁，借款决裂，万事棘手。今日救国之第一策，在新内阁之成立而已矣，盖缺是则为无政府之国，以吾国危象环生，有强有力之政府以为之斡旋，犹惧其不济，而况陷于无政府之地位者乎，天下皆望之若云霓，而参议院诸公若故靳之而不予，此何为者也？……陆总理蜚声于国际之间十数年于兹矣，外人信用之，国人亦信用之，参议院于此正宜力为之助，以受折冲樽俎之效，而顾力持破坏以实行消极的推翻主义，参议院诸公亦尝一辨其利害之所在乎！”7月28日《申报》头版题为《论参议员不足以代表人民之心理》的评论，更是直接提出了“议院专制”的说法：“参议员之罪案，昭昭也。我民而不承认此种主张者，参议员为身受委托之人，受委托而不能尽职我民，当然有严词诘责之权，或别思所以惩戒之法，不能听其养成议院专制之习，而使堂堂古国常陷于无政府之恶境也。”

《大公报》7月21日头版又发表题为《参议院否认六总长之骇闻》的评论，对参议院竭尽揶揄讽刺之能事：“乃不顾时局，不恤人言，各持党见，以争一日之胜败。始则以投票不投票之争，拍案不已，互相辱骂，辱骂不已，几至群殴，议场秩序，为之大乱；继则不待讨论，强迫投票，全案推翻，则其所谓预备者，不过运动反对之预备，非研究事实之预备，不过把持选举之预备，非征取意见之预备；在破坏者之目的，固已达矣，在破坏者之心，固已快矣，其如大局何？”当时舆论对于不同党派的抨击亦有所不同，对于共和建设讨论会往往称其别有一种眼光，并无私意；对于同盟会谓其固执党见，不顾大局，但总算有一种政策；而对于统一共和党最为严厉，称其反复无常，专谋私利^②。

^① 《二次阁员否认后之各政党》，《申报》1912年7月29日。

^② 《组织第二次国务院之结果》，《申报》1912年7月26、27、28日连载。

甚至同盟会报纸《民立报》对于本党在参议院的卤莽举动，也持批评态度。血儿称：“参议院于提出之新国务员竟至全数否认，使政府不能早日成立，其失计莫过于此。”章士钊也评论道：“昨报陆总理所提出之国务员参议院悉行反对，致使北京无政府之状态日甚一日，惹外人之轻视，重国内之葛藤，参议院之不顾大体一至于此，此记者所为深惜者也。”嘯秋亦悲叹道：“新阁员之不得参议院同意也，国可亡而意气不可息，种可灭而私见不可除，人心死矣，谁能救之？呜呼！此可为痛哭者也。”^①同盟会党报对本党参议员严厉批评，又一次生动地说明了民初政党组织极为松散，政党的五个主要部分：领袖、职员（本部、支部）、议员、报纸和本党地方势力，各不统属，意见分歧，很难形成一支强大的有组织力量。相比之下，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以个人效忠为纽带，以家长制的权威为中心，这种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组织方式反而更严密有力得多。

来自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人物对袁世凯的支持态度决定了政治形势的基本格局。袁世凯在取得优势之前，非常注意对各省实力派的拉拢。六总长否决后，袁世凯于22日通电各省都督备诉苦衷：“十八日提出参议院，乃提出之后颇闻院内议论不能一致，深恐一旦决裂，无可挽回，特具函请其展缓投票，再行协商，世凯之委曲求全，盖已无所不至。不意此日参议院宣言此函作为无效，即日投票，六总长全数否决。此六人者，或久历外邦、或有功民国、或学有专长、或富有经验，纵不能全予同意，亦何至无一可用之才，乃始则拒绝协商，继则全体否决？”^②

各地实力人物没有让袁世凯失望，“黎副总统及沿江各都督俱电致袁总统，以参议院不足代表国民公意，若再拘执党议必至亡国，语皆激烈沉痛”^③。黎元洪电曰：“六部改组，竟成泡影，谁为厉阶？遂使莽莽神州陷于无政府地位。国之不存，党于何丽？筹思及此，五内俱焚。……惟有诉请各都督共扶危纲，以救危局。”^④此电明显暗示凭各督实力压迫参议院，甚至置参议院于不顾。江苏都督程德全电称：“民国告成，已越半载，建设之事百无一闻，尔来党见分歧，争持激烈，内阁竟难成立，大有陷于无政府之险象。溯我民国缔造之初，奔走国事力尽义务者，皆爱国之志士及忠勇之军人，其他侪辈率皆匿迹销声，不知所在。目下局面粗定，向之伏处不出者，今则大言庞庞，党同伐异，悍然破坏大局而不顾，我军人志士生命血肉所构成之民国，行将断送于空言横议之徒，言念及此，能无痛恨！”^⑤此电则明显暗示军人可能干涉政局，一贯以稳健著称的程德全竟如此激烈，影响更大。统一共和党的主要实力赞助者云南都督蔡锷电京，“痛斥统一共和党为卑污无耻，淆乱国是，宣告脱党”^⑥。另外，直隶都督张锡銓、河南都督张镇芳、浙江都督蒋尊簋、第二军军长徐宝山、第五军军长朱瑞等皆通电声讨参议院，各省军政要员大多致电参议院

① 行严：《北京政局之大波动》，血儿：《时局伤心谈》，嘯秋：《哀哉人心死矣》，《民立报》1912年7月21日。

② 《北京大总统电》，《申报》1912年7月28日。

③ 《北京电》，《申报》1912年7月22日。

④ 《中华民国内阁篇》，《张国淦文集》，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222页。

⑤ 《程雪楼痛责参议员》，《申报》1912年8月1日。

⑥ 《北京电》，《申报》1912年7月21日。

谴责,一时间参议院每日函电盈尺^①。江苏省议会亦通电称:“参议院前日信任总理,甫经旬余,未见政事成败之迹,忽又以不信任闻,国民索解不得,益滋疑骇。贵院诸君宁不以国为前提,国苟不存,党于何有?”^②北京军警也连日集会示威,向参议院施加压力,原湖北第四镇统制邓玉麟(此时在京)竟致函参议院,声称议员不惜亡国,军人即不守法,誓必以铁血溅之,引起议员恐慌^③。此时,袁世凯通过国务院通电请各省选派代表三人驻京,直接与中央保持联络,明显有架空参议院之意。解散参议院、大总统直接任命国务员待正式国会解决的呼声也不时响起^④。

有了各地实力人物的支持,袁世凯压服参议院的决心越发坚定了,总统府传出消息:“此次提出阁员,尽可再不通过,好在能做阁员者甚多,再通不过,政府又再提,又再通不过,政府又再提,只要议会本身能站得住。”^⑤袁世凯首先召见陆征祥,“语之云:日俄外交紧迫,君之辞职,于国危否?请凭良心筹之”。陆沉吟良久,“慨然云:我本抱牺牲一切之见,总统既掬诚相示,我决不再辞”^⑥。稳住了陆征祥之后,袁世凯本可更加强硬一些,但他并不出此,却于21日约见全体参议员疏通意见。这正是袁世凯的成熟老练之处,不到有绝对把握之时,决不轻言决裂,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寸步不让,在表面上则尽量满足对方的虚荣,以期最大限度地减少反对。是日大雨滂沱,议员到者77人,袁世凯的演说很客气也很严肃,在介绍了国内、国外的险恶形势后,他说道:“贵院与政府一德一心共谋救国,譬诸同舟遇风,国民为乘客,诸君为船主等职员,居发踪指示之地位,鄙人勉为舵工,受命以行于所欲达之方向。若因不受命而误方向,鄙人之罪,若指示不适宜,诸君宜有以对乘客。一切惟希谅解。”袁世凯口才极好,“演说大气盘旋足以囊括一切”^⑦,并且富于表演天才,“神情激越,声泪俱下”,远非陆征祥可比。相当一部分议员本无定见,多数“鼓掌感动”^⑧;副议长汤化龙致答词,亦称:“各地秩序渐复,全赖大总统之威德,同人实深感戴。至外交、内政,但政府定有方针,本院无不同心赞助。”^⑨就这样,参议院与袁政府的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在各方面出乎意料的强大压力之下,许多参议员的态度已经明显转变,加之袁世凯的软硬兼施,参议院中改组内阁的狂热梦想已经显得不切实际。参议院的组成实际是一种联邦制的结构,各省不分大小选派5名议员代表地方,失去了地方的实力支持,纸上的法律不能给参议院带来任何力量,而且作为人民代表的议员也不得不服从舆论的总体趋向,这是代议制的基本原则。参议院只能屈服,也只有通过屈服才能生存下来,否则就可能毫无困难地被解散或改组。统一共和党无“全体辞职之决心”,已放弃倒阁,对新提出的六名

① 《公电》,《申报》1912年7月27日。

② 《江苏省议会电》,《申报》1912年7月25日。

③ 《北京电》,《申报》1912年7月26日。

④ 《申报》1912年7月24、25日。

⑤ 《中华民国内阁篇》,《张国淦文集》,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222页。

⑥ 《北京电》,《申报》1912年7月22日。

⑦ 《总统招待参议员》,《申报》1912年7月28日。

⑧ 《北京电》,《申报》1912年7月22日。

⑨ 《总统招待参议员》,《申报》1912年7月28日。

国务员，决定同意范源濂、许世英，对周学熙自由投票，不同意陈振先、朱启铃、蒋作宾，只有谷钟秀等少数不肯妥协，随即提出弹劾总理案，但以出席人数不足无法开议；同盟会内部分歧，已无法坚守原意，大致成为自由投票的状态；共和建设讨论会劝共和党组阁不成，汤化龙、刘崇佑也无法再坚持倒阁，只是拒绝到会投票，以示消极^①。7月26日对于再次提出的国务员举行投票，到会议员91人，旁听者竟有300多人，虽然预料多数议员态度已经转变，但气氛仍相当紧张，共和党中性格最为暴烈的刘成禺竟然携枪入场，旁听席中更有带枪的危险人物，当时参议院中有流血的危险并不是虚幻的。好在投票结果周学熙（财政）得54票、范源濂（教育）得70票、许世英（司法）得70票、陈振先（农林）得57票、朱启铃（交通）得47票获得通过。议员中全投赞成票的有39人，应该是共和党；全投反对票的只有11人，应该是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中的少数强硬分子；另有41人多数投赞成票、少数投反对票，是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转变立场的多数派。只有原陆军次长蒋作宾改任工商总长明显不妥，只得44票（仅差2票）被否决，8月2日又提刘揆一也获通过，陆征祥内阁总算在名义上成立了^②。

结 语

经过陆内阁危机的较量，议会和政党的声誉越发降低，越发孤立无援，地位岌岌可危，而袁世凯的威望明显上升，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地位日益巩固。《民立报》引外电报道：“袁总统经此挫折，益显其强毅之态，此后恐参议院将不易施其掣肘之术。”^③此后，这一升降模式不断重复，日积月累，直到袁世凯取得绝对优势的统治地位。本来，在民国元年袁世凯能够控制的只有几师的兵力和三省地盘而已，在全国八十多个师的兵力和二十几省地盘中并无支配性力量，但是他通过苦心经营把为数众多的中间力量逐渐拉拢到自己周围，一点一点变得强大起来；反观代表新兴力量的议会和政党，本来就没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长期积累的合法性，在革命之后声望和势力急剧升高，却不能以如履薄冰的态度谨慎保持，以为大功告成、唯我独尊，提出多数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政策，结果把庞大纷杂但举足轻重的中间力量推到对手一边，随着基础和力量一点一点丧失，到1913年被袁世凯轻而易举地彻底击败。

（张永：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① 《咄咄不可思议之总理弹劾案》，《申报》1912年8月3日。

^② 《申报》1912年7月27日、8月3日。

^③ 《西报译电》，《民立报》1912年7月28日。

章宗祥“卖国”辩伪

钟 城

内容摘要 “二十一条”交涉时，章宗祥为司法总长，正忙于全国知事考试，未参与对日交涉。“二十一条”签字的是陆征祥，而非章宗祥。章是在“二十一条”签字后，袁世凯倒台、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时出任驻日公使的。1918年日本新任外务大臣后藤新平就山东问题照会章宗祥，章旋告以中国政府对此“欣然同意”，这成为章在五四运动中被攻击的一个要因。然细察史实，此照会实为对华比较缓和的寺内内阁提出，对中国还算比较有利。对此照会“欣然同意”，绝非卖国。且此“欣然同意”仅限于此一照会，而非“二十一条”。任驻日公使期间，章还经手了多次向日借款事宜，给人留下亲日的印象，这也是一种误解。在后来日本侵华的过程中，章宗祥始终未出任伪职，故在战后，不论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人民政府，在处理汉奸的时候，他均未受到牵连。

关键词 章宗祥 五四运动 “二十一条” 欣然同意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外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割让、强迫租借了许多土地。这些丧权辱国条约签订的责任人、决策人、签字人是否就是卖国贼？在近代史书籍中似乎还没有明确地指明。但是每年的五四运动纪念日使我们通过反复学习，对其政治上的伟大意义的认识不断强化。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促发了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好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从而开辟了新的历史纪元。在运动中被群众认定为卖国贼的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作为五四运动的对立面恶名昭著，至今仍被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现在看来，作为卖国贼，在法治社会应通过法院或军事法庭判决，人证物证应俱在。既然卖国，就有所得，他们从帝国主义那里到底得到多少利益，允将获得多高的官位？作为外交官员，他们到底应负多少责任，是哪些责任？这些至今尚未清楚。若能冷静下来较系统地研究与五四运动最有关的二十一条前后的史料，仔细梳理一下历史事实及其发展经过，比勘分析，应可以得出更确切的结论。五四运动从各方面的评述文章已经甚多，曹汝霖的回忆录及相关文章也出版并增多起来了。运动中受辱最深，差点因挨打送命的章宗祥其人之评述文章却乏见，他的回忆录等亦未见公开发表。笔者在学习调查的基础上，拟作一些粗浅的评价。盼望专家、读者指正。

一、章宗祥与二十一条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霸占了台湾、澎湖，又将福建划入势力范围。1898年德国强迫中国租借青岛和胶州湾，规定胶澳海面潮平周围100里（中国里），准德国军队随时过调，主权属中。胶澳之口南北两面及岛屿若干处租与德国，以99年为限，并让德国造胶济铁路。后又准德国在山东盖造铁路二道即高密至韩庄，济南至京汉线上的顺德、新乡之间，使胶济线与津浦铁路和京汉铁路相连，并可于铁路附近30公里开采矿产。1904年胶济铁路竣工。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清王朝倒台。同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俄为一方，德、奥、土为一方。中国同年8月6日宣布中立。日本虽参加英法一方，但未派兵赴欧洲战场，却于8月15日通知照会德国，要他们立即退出中国领海，9月15日前将胶澳租借地全境移交日本。当时说得好听，是以备他日交还中国，并要求德国在8月23日正午前无条件承认。德未应，日本乃于9月3日在山东半岛北部龙口登陆，后分兵一面向南攻青岛，一面向西占领胶济铁路直到济南，又在英国协助下从海上攻陷青岛。中国政府在同年9月3日、27日、30日，10月2日、9日，1915年1月9日、16日屡次提出抗议，日本傲慢地不予理睬。为了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进一步控制中国，日本在1915年1月18日进而蛮横地向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罪恶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共分5部分，第1部分是要求德国在山东的利益由日本继承；第2部分是要求日本在东蒙南满享有优越地位；第3部分是要求合办汉冶萍公司；第4部分是要求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让于他国；第5部分是要求在内政、警察、军事方面作中国的顾问以扼我要害。在谈判中，中国对前4部分提出修正案，拒绝第5部分。事态僵持到4月26日，日方提出最后修正案。同时日本在山东、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派军舰游弋，关东宣布戒严，日侨准备撤退，事态使得一时人心惶惶。在这紧急关头，5月1日中方也提出最后修正案。5月7日日方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最后通牒，要求照日本4月26日的修正案签约，不得作任何更改；5月9日午后6时前必须有满意的答复，否则将采取必要之行动。袁世凯召开了多次紧急会议，最终被迫接受。当时外交总长陆征祥、外交次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輿参与了讨论。章宗祥时任司法总长，当时正值全国知事考试，他兼任知事考试委员长。旧例规则甚严，他必须依例住宿在考场月余，未参与外事。直至交涉将破裂，曾应袁世凯命参加了内阁会议。会后又赴考场。二十一条签字人是陆征祥。他曾写过一文《我经手签订二十一条痛史》，诉明了签字前后的痛苦经过。他向袁世凯说“我签字即是签了我的死案”，“三四年后，一辈青年不明白如今的苦衷，只说我陆征祥签订了丧国辱权的卖国条约，我们要吃他的肉”。袁世凯只有苦笑，并问：“这事在外交上有何补救办法？”陆说：“只有参战，到和会时再提出，请各国修改，不过日本是否阻挡，现在不可知。”^①照理说，五四运动应该声讨他，打倒他。可运动中没有涉及他的名字，因为其时他作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团长和顾维钧等一起正为维护国家权益，艰难地和日本及包庇

^① 陆征祥：《我经手签订二十一条痛史》，<http://www.docin.com/p-56336110.html>。